

解读新型城市化^①：从表面的数字指标到真正的城市生活

An Interpreta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from Superficial Index to Real Urbanism

作者：刘健，博士，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liujian@tsinghua.edu.cn

进入 21 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以一系列事实证明了美国学者、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的著名预言——“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类 21 世纪的两件大事”。2010 年，中国 GDP 总量首度超过日本，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1 年，中国城市化率首次突破 50%，开始迈入“城市社会”；2012 年党的十八大以后，“新型城市化”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甚至被视为新时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探索“新型城市化道路”的现实意义无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在改革开放的 30 多年里，中国城市化发展成就显著，尤其是城市化指标的提升和城市数量与规模的增长有目共睹；与此同时，现行城市化模式带来的问题同样无法回避，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环境污染的肆虐，地区差异的扩大和城乡发展的失衡，交通拥堵的加剧和住房成本的增加，公共服务的匮乏和社会公平的式微，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不成为中国未来城市化发展必须应对的挑战。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虽有工业发达国家在城市化进程中领先中国一步，积累了大量可资借鉴的有益参照，但因时代背景的变迁以及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未来的城市化道路显然不能简单照搬任何一地的既有经验，而只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基于自身的特殊国情，探索可行的发展出路。

不可否认，城市化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现象，有其自身的客观发展规律；对此，分析工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可

见一二。例如，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二者相辅相成即可形成良性循环，成为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化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每个阶段都会面临不同问题，需要建立从战略方针，到政策措施，再到实施工具的完整政策体系加以应对；在人口发展方面，城市化主要表现为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从农业生产领域进入非农生产领域的变化过程，并以城市化率作为衡量指标；在空间发展方面，城市化主要表现为自然空间转变为人工空间的变化过程，且人工空间中城市生活质量的高下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物质环境，特别是市政基础设施和社会服务设施的建设水平；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值得注意的是，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城市化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并不在于城市化率的提高和城市空间规模的扩大，而在于它所带来的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文明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亦即英文中的 urbanism 和 urbanity）。

因此，未来中国的“新型城市化道路”必须改变过去 30 多年以量为主的发展模式，转而强调城市化发展的质量，重视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城市公民和具有城市文化的生活方式，而不是一味强调城市化率、城市数量和城市规模等一系列数字指标的持续提高，以及以房屋建设为主的城市物质环境的外在改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未来的“新型城市化”将是一次使其从传统农村社会蜕变为现代城市社会的深刻社会变革，其中人的思想认识以及随之而来的生活方式的转变将是这场社会变革

的重要社会基础，远比数字指标的提高和物质环境的改善更为重要。

为此，中国社会首先需要经历一场像欧洲文艺复兴一样的全民启蒙运动，打破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城乡二元结构对人的思想认识的束缚，进而建立起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对“城市”、“城市化”以及“城市生活”的社会共识，充分认识“城市”和“城市化”所具有的社会和文化内涵及其在“城市生活”中的具体体现，而不仅仅是经济、人口等数量指标。社会共识的缺失必然导致城市化目标的飘忽不定，并使新型城市化沦为自上而下的一厢情愿。

其次，中国社会需要建立起以人为本，而不是以单一的经济发展为根本的城市化政策体系，并将其贯彻到从战略方针，到政策措施，再到实施工具的各个层面，以引导健康的城市化进程；毕竟，只有人才是发展的根本，缺失了对人的关注，任何发展都将难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高质量、高效率和高文明的城市生活和城市文化也就无从谈起。着眼于当前的中国国情，对户籍、土地、房产以及包括教育、医疗和养老等在内的社会福利制度的改革，应该成为建立以人为本的城市化政策体系的第一步。

文章编号：1673-9493 (2013) 03-0044-01
中图分类号：F299.21
文献标识码：B

① “城市化”又称“城镇化”，为英文“urbanization”一词的中文译文。英文词根为“urb”，意为“城市”，强调的是城市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属性，而不是行政区划或行政等级。因此在中国现行的行政区划中，市和建制镇，特别是其总体规划划定的规划区范围，均属“城市”的范畴。为避免概念混乱，本文统称为“城市化”。